

常州博物馆论文集

(第一辑)

常州博物馆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常州博物馆论文集

(第一辑)

常州博物馆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州博物馆论文集. 第一辑 / 常州博物馆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161 - 8115 - 7

I. ①常… II. ①常… III. ①博物馆学—文集
IV. ①G26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985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郑 彤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651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主 任：林 健

副 主 任：钱 潮 黄建康 邵建伟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永红 朱 敏 邵建伟

林 健 姚 律 钱 潮

袁 勤 黄建康 彭 辉

路亚北 谭杨吉

主 编：邵建伟

副 主 编：谭杨吉 吴文婉 文祥磊

序

自先贤季札封于延陵，开创常州人文历史以降，常州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尤为兴盛，涌现了常州学派、常州画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孟河医派等。常州学人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堪称翘楚。清代诗人龚自珍曾慨叹“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便是对常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文化底蕴的最好诠释。

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往往可以在城市博物馆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博物馆肩负着传承历史、传播文化的重任。常州博物馆作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含全省唯一的一家少儿自然博物馆），蕴含丰厚的常州历史文化，这种以文物为载体的积累形成了常博独特的资源优势。建馆50多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几代博物馆人的励精图治下，常州博物馆在文物收藏、考古发掘、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收藏是博物馆各项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我馆馆藏文物和自然标本总量近3万件，以良渚文化玉器、春秋原始青瓷器、南朝画像砖、宋代瓷器、宋元漆器和明清书画为收藏特色，同时形成了昆虫、海贝、鸟类、兽类、地方性中草药、矿物晶体6个系列的自然标本收藏体系。这是常州先民留下的宝贵财富和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我们继承弘扬、开拓创新、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

考古是博物馆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年来，我馆主持并参与了新石器时代圩墩遗址、新岗遗址、寺墩遗址和春秋淹城遗址、恽家墩汉墓、戚家村南朝画像砖墓、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遗址与墓葬的发掘，培养了一支专业考古队伍，涌现出一批在田野考古、史

前研究、文物鉴赏等领域具备相当知名度的专家学者。

研究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我馆多年来重视学术研究，相继出版《常州文物精华》《常州博物馆五十周年典藏丛书》《常州新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常州博物馆藏世界名蝶》等10余部专著、图录。馆刊《常州文博论丛》自1989年创刊以来，保持一年两期的出版，从最初的内部交流资料，到如今成为公开出版物，始终是常州地区文博界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园地。

《常州博物馆论文集》（第一辑）是常州博物馆学术研究方面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作者以我馆在职员工和退休专家为主，内容涵盖考古、文物、艺术、博物馆学、地方史、自然科学等6个方面，大部分文章是近年来在各大专业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和论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常州博物馆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当然，这本论文集只是我馆学术研究前进道路上一次小小的总结，并将成为学术研究迈上更高平台的新起点。由于水平有限，编辑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常州博物馆馆长

林 健

目 录

考古研究

圩墩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的回顾与思索	陈丽华 彭 辉 (1)
边缘性遗址在考古研究中的价值	
——以江苏常州史前遗址为例	彭 辉 (8)
吴文化与古代民族融合	黄建康 (14)
常州兰陵恽家墩汉墓发掘简报	常州博物馆 (20)
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	骆振华 陈 晶 (53)
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	陈 晶 陈丽华 (60)
从常州宋明两代墓葬出土器物看宋明两代丧葬礼仪	王偲人 (72)
常州市广成路明墓的清理	常州博物馆 (77)
常州市怀德南路明墓的清理	常州博物馆 (84)
略论 1959 年发掘大汶口墓地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分期	于成龙 (90)
古代中国大豆属 (Glycine) 植物的利用与驯化	
..... 吴文婉 靳桂云 王海玉 王传明	(98)
史前石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 宇 钱耀鹏 (109)
甘肃华亭麻庵冶铜遗址初步考察研究	韩 超 李延祥 (121)

文物研究

常州博物馆收藏的良渚文化玉器	陈丽华 (130)
良渚文化神徽解析	黄建康 (142)
吴文化玉器综论	陈丽华 (151)
略论六朝时期的陶瓷手工业	徐伯元 (162)
常州戚家村画像砖墓图像主题思想浅见	姚 律 (170)
漫说常州北宋石经幢	邵建伟 (180)

常州两宋瓷话之青瓷篇	朱 敏 (183)
出土宋代剔犀漆器的概论	陈 晶 (195)
常州博物馆藏五代宋元漆器髹漆技艺解析	谭杨吉 (213)
江苏常州出土宋元时期泥塑	彭 辉 (220)
谈五岳真形镜	李 威 (227)
翳翳冬日又何妨 ——古代冬季生活器具初探	符 岚 (233)

艺苑撷英

北朝敦煌写经书法分期与风格转变原因探究	文祥磊 (242)
唐玄宗的隶书贡献及唐隶对清隶的影响	叶鹏飞 (260)
试谈宋代至明初毗陵草虫画及在东亚的影响	林 健 (271)
《恽寿平经管祠田札》考论	文祥磊 (283)
《小孤山图轴》鉴赏	陆澳波 (290)
浓妆淡抹 秀逸自然 ——小议张宗苍及其《西湖行宫八景图》	程 霞 (295)
清朝汤氏家族画家	左树成 (299)
不傍一人 不依一法 ——戴熙及其《龙湫观瀑图卷》刍议	程 霞 (305)
略说书画扇	丁为新 (311)
宋辽金银器中的唐风探微	张如嫣 (320)
浅谈常州的象牙浅刻艺术	梁文杰 (324)
常州博物馆藏留青竹刻作品赏析	刘颖娜 (331)

地方历史

古代常州运河通漕济运水利方略释读	邵建伟 (335)
常州传统祭祀概述	邵建伟 (346)
浅谈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刘 莹 丁 玥 (357)
关于唐代“西蕃”一词是指称吐蕃还是回鹘问题的再讨论	姚 律 (362)

博物馆学

免费开放后的博物馆教育 ——中美博物馆观众教育比较研究	林 健 (371)
论博物馆的立馆思想与教育功能	路亚北 (376)

博物馆教育：成人教育的重要方式	丁晨玥 (382)
论新形势下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教育	张 华 (390)
从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思考	
——试论为观众设置具有思辨性的临时展览	惠露佳 (395)
中小型博物馆志愿者社会化发展方向思考	
——以常州地区博物馆为例	李 敏 (401)
浅论博物馆临时展览的策划与设计	王 艳 (406)
《谢稚柳 陈佩秋书画联展》观众对比调查报告	路亚北 左佳佳 蒋明珠 (412)
云计算在智慧博物馆建设中的应用	刘朝东 (418)
多媒体技术在博物馆中的运用策略	谢志博 (422)

自然博物

蝉花的本草学考证与基源研究	万永红 蔡开明 韦 曙 (427)
常州地区野生有毒植物的调查研究	万永红 路亚北 龚祝南 (433)
澄江生物群浅谈	雷倩萍 (439)
皖北地区寒武系芙蓉统三叶虫褶盾虫属 <i>Ptychaspis</i> 及其种内差异	雷倩萍 (448)
我国动物标本剥制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韦 曙 (466)
双叉犀金龟（独角仙）饲养方法初探	蔡开明 (469)

圩墩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的回顾与思索

陈丽华 彭 辉

一 圩墩遗址发掘年表^①

1960—1961年，南京博物院在苏南地区进行考古复查时，发现圩墩遗址。

1972年11月，常州市博物馆（今常州博物馆）在遗址中部偏南处开方试掘约20平方米，清理墓葬24座。试掘结果表明，该遗址墓葬与嘉兴马家浜遗址墓葬相似。探方出土器物与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的下层及墓葬、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下层、上海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器物相似。

1973年冬，圩墩村生产队在圩墩遗址上的麦田里挖排水沟时，发现完整的人骨架5具以及连接成片的红烧土。南京博物院和常州博物馆遂对遗址分布范围进行钻探，明确遗址范围在20万平方米以上。

1974年4—6月，南京博物院和常州博物馆发掘圩墩遗址625平方米。在下文化堆积层发现木桩和带木桩的长条形方木，还有成片的草木灰烬和较多的野猪、麋鹿、梅花鹿等兽骨；中文化层发现62座墓葬以及印有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共出土各类文化遗物265件。

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常州博物馆对戚墅堰圩墩遗址发掘164平方米，清理墓葬30座，发现人骨架32具，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及加工木器等遗物。

1985年9—11月，常州博物馆联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对圩墩遗址发掘450平方米。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33座，出土的木器在品种、数量上突破同类型遗址的发现。

1992年1—2月，圩墩遗址发掘586.25平方米，清理墓葬32座、水井两口、灰坑3个、灰沟3条，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

二 圩墩遗址的发掘意义

1972年11月，常州博物馆在圩墩遗址开始试掘，这也是太湖西北部第一个正式发

^① 本节根据《马家浜文化》一书中《马家浜文化纪事》一节编写，载嘉兴文化局《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31页。

掘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当时,马家浜文化的概念尚未确立,但发掘者通过出土器物的比较,已经将圩墩遗址与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及上海崧泽遗址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把马家浜文化的分布范围拓展到太湖西岸,在宏观上首次勾勒出马家浜文化的地域范围,为日后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和定义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后,随着太湖流域诸史前遗址的陆续发现和发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马家浜文化的正式定名,^①关于马家浜文化类型的认识过程乃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太湖流域史前文化谱系的建立,圩墩遗址都成为其中避不开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圩墩遗址的发掘,对于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创始之功。

圩墩遗址发掘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发现马家浜文化陶釜存在的差异。张敏先生在谈及马家浜文化的发现时说:“首先发现马家浜文化的陶釜存在差异的是陈晶女士。陈晶女士在发掘常州圩墩遗址后,发现马家浜文化的陶釜存在明显的差异,即存在平底与圜底的差异。”^②在此基础上,陈晶女士提出了马家浜文化存在着两个类型,即“草鞋山—圩墩”类型和“罗家角”类型,^③一时在学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现在看来,陈晶女士对于马家浜文化类型的分法,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从此之后,以马家浜文化最具特征性的器物——陶釜作为区分文化类型的标志,逐渐成为马家浜研究者的共识。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南京博物院在太湖西部所进行的马家浜文化遗址课题研究,揭示了祁头山、骆驼墩、彭祖墩、西溪、神墩等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址,令人信服地建立起太湖西部以平底釜为特征和太湖东部以圜底釜为特征的两大文化类型框架,这不能不说是马家浜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最重大突破,而取得这种认识的基础,是与既往的研究认识分不开的。从这个层面上讲,陈晶女士20世纪80年代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功不可没。

三 圩墩遗址墓葬的研究价值

圩墩遗址是一个以马家浜文化氏族墓地为主要特色的史前遗址,圩墩遗址5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91座,其中马家浜时期墓葬181座。对于圩墩遗址墓葬特征的表述,已见诸各次发掘简报,此处不再赘述。但从近年来新的研究视角观察分析,圩墩遗址墓葬仍有相当多的探究之处。

根据日本学者久保田慎二对马家浜时期各遗址的统计研究,^④圩墩遗址墓葬的墓向

①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② 林留根、郭伟民等:《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下),《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

③ 陈晶:《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日]久保田慎二:《马家浜文化的地域性——以墓葬的分析为主》,载《江南文化之源——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图文集》(上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早期集中在 15°—20°和 340°—345°，晚期则集中在 355°—15°和 40°—45°，虽然整体而言墓向是北向，但晚期墓葬偏东向的角度更大一些。这种变化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似乎观察不够。另外，过去的研究认为，圩墩遗址是一个盛行俯身葬的遗址，根据统计数据，圩墩墓葬早期阶段俯身葬式 41 例，仰身 4 例；晚期阶段俯身 89 例，仰身 10 例。可以看出，晚期阶段圩墩墓葬中仰身葬式的数量也在缓慢地增长。这两点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被重视，当然是由于太湖两岸考古发掘工作不平衡所致。近年来太湖西部马家浜时期诸遗址的发掘成果，尤其是以骆驼墩、祁头山为代表的平底釜文化类型的发现和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圩墩遗址晚期阶段丧葬习惯的改变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如果比较太湖西北部几处比较重要的遗址类型（表一），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圩墩遗址晚期阶段已经明显受到以祁头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的影响和冲击，而且不单是圩墩，圩墩西部的新岗、更西部的三星村遗址都受到了此种影响，这或许可以成为研究祁头山遗址类型晚期阶段活动路线的新角度。

表一 新岗遗址与周边主要遗址马家浜晚期阶段墓葬形制对应表

		新岗遗址	圩墩遗址	祁头山遗址	北阴阳营遗址	三星村遗址
墓向		北	北、东北	东	北	北
葬式		仰身	俯身、仰身	仰身	仰身	仰身
葬制		竖穴土坑	平地掩埋	竖穴土坑	平地掩埋	平地掩埋
随葬品	陶器	釜、豆、盆、盘	釜、鼎、豆、钵、壶、罐	釜、豆、钵、盆		鼎
	石器	纺轮、斧	纺轮、镑	镑、斧	镑、斧	
	骨角器	鹿角靴形器、角锥	骨针、鹿角靴形器	骨筭		
	玉器	玦	玦、管	玦、管	管、璜	
随葬方式		陶釜敲碎铺在死者身上，豆盘以下敲掉，将豆盘或陶盆覆盖于死者面部，墓内摆放花石子	纺轮放在腰部旁边	陶釜被打碎后放在头部或上半身上，豆和三足钵的脚部被敲断，然后把盘部放在头部旁边	花石子置于死者口中	把脚部被敲断的鼎放在头部旁边

圩墩墓葬的价值还在于出土的人骨架保存得非常好，我馆当年提取的十余具圩墩人骨架，40 年后，长骨的骨质仍保持坚硬，颅骨圆整光滑，牙床整齐，这在土壤酸化

程度高、地下水位高的江南地区实属罕见。在所有已发掘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也只有金坛三星村遗址墓葬骨架可与之相比。如果仔细对比这两处遗址就会发现,这两处遗址都有丰富的蚬螺堆积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蚬螺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在漫长的堆积腐蚀作用下逐渐中和了土壤中的酸性物质,使得土壤土质整体呈中性或弱碱性,腐蚀性较弱,有利于骨架的完整保存。除此之外,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马家浜时期目前已知具有大面积蚬螺堆积的遗址除了圩墩、三星村之外,尚有宜兴西溪遗址^①和骆驼墩遗址,西溪遗址未发现大型墓地,而骆驼墩遗址墓葬保存条件不佳。这是因为,骆驼墩的蚬螺堆积位于第⑧层下,墓葬层位于第③、④层下,蚬螺堆积显然与墓葬没有关系。研究者认为,骆驼墩遗址的蚬螺堆积是作为一种资源来存放和处置。^②而圩墩和三星村两地,墓葬层位于第③、④层下,蚬螺堆积层即为第④层,三星村“从发掘情况看,(蚬螺层)基本覆盖墓地的全部”^③。圩墩遗址也是类似的情况。这说明马家浜晚期阶段,人类有可能已经认识到蚬螺层在防潮方面的作用,从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以往我们在发掘中比较看重蚬螺堆积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模式方面的价值,^④今后似乎也应注意这类特殊遗迹现象的功能性意义。

圩墩墓葬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先民个体存在生前拔牙的现象。根据上海铁道医学院口腔系和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组对圩墩遗址第1—3次发掘中的115例标本观察研究^⑤表明,圩墩遗址的拔牙行为只发生在成人间,总拔牙频率为39.2%;其中以上颌中切牙与侧切牙组合缺失情况最多(81.6%);女性均为右侧中切牙与侧切牙缺失,而男性则两侧皆有。这充分说明,圩墩人的拔牙完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科学家通过对齿部的X光透视分析进一步指出,圩墩先民的拔牙方法,可能是先用石镑适度连续敲击,使要拔除的牙齿脱臼松动,然后以骨镞或骨铤拔去,与现代拔牙方法基本相似。^⑥韩康信对我国拔牙习俗的源流和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圩墩遗址的拔牙风俗可能源于大汶口文化的影响,^⑦并且与大汶口文化高达60%以上的拔牙率相比,呈现明显的衰退过程。鉴于圩墩遗址仍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拔牙现象最多的史前遗址,^⑧如何继续利用这批珍贵的人类学资料,如何理解圩墩人拔牙风俗背后的文化意义以及这一习俗在整个马家浜文化圈中的独立性,是今后医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

① 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南京师范大学、金坛市博物馆:《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④ 林留根、郭伟民等:《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上),《东南文化》2011年第6期。

⑤ 孙佩波、尤宝芸等:《圩墩新石器时代人头骨解剖生理和口腔疾病的研究——拔牙情况的研究》,《口腔医学》1993年3月第13卷第1期。

⑥ 同上。

⑦ 韩康信、潘其凤:《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年第1期

⑧ 除圩墩遗址外,崧泽遗址发现2例,三星村遗址发现1例。韩康信认为,三星村遗址不流行拔牙风俗。参见韩康信《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

学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金坛三星村遗址发现较晚,也更好地借助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如三维建模的人像复原、基于骨骼病变的病理学研究等。那么,圩墩遗址所保留的良好的骨架标本,或许仍然可以发挥其价值,比如人像的面部复原,骨骼稳定同位素的分析,乃至南方新石器时代体质人类学的谱系研究和基因资料库的建立,都有进一步探索和发挥的空间。

四 圩墩遗址在多学科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圩墩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十分重视多学科协作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条件下,一个地市级的中型博物馆,能有这样的课题意识,无疑具有相当的超前理念。在圩墩遗址的第四次发掘过程中,由常州博物馆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作为发掘组织者,约请上海博物馆人类学组、南京大学地理系第四纪环境研究人员、南京林业大学树木学研究人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及浙江农业大学相关科目的研究人员,尝试进行所谓“开放型”的田野考古发掘。^①这种开放性在于约请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共同参与发掘的始终,在发掘中现场考察、分析、商讨、采样,系统收集标本。这样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模式其实在最近几年国内的大型考古工作中也多次被采用,是国家文物局倡导建立的理想考古发展模式之一。但在30年前的圩墩遗址发掘中,这种方法还属于一种实验性的组织模式。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圩墩遗址的第四次发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古人类、古动物、古地理、古气候、树木学、第四纪环境等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由科技工作者采集选定的几组碳十四标本都测出了令人信服的测年数据,为后来同类型的遗址确立了可资参照的年代标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计算机技术尚未推广的条件下,圩墩遗址的发掘者采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尝试对遗址出土釜类器进行统计研究。^②为了研究精确,发掘者对考古发掘的陶片进行了完全采集,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经过对圩墩遗址第四次发掘统计,四个探方(400平方米)范围内,共出土釜类器638件,其中下层475件,上层163件。遗址内出土最多的直口筒形腰沿釜平均口径25.3厘米,平均底径9.8厘米,口至腰沿平均高度6.3厘米,底至腰沿平均高度12厘米。以此数据推算,该釜的体积约在18—20立方厘米,如果用来煮米饭,一般可以煮1—1.5公斤,从而可以得出圩墩遗址单位面积内稻米的总消耗量。现在看来,当年所进行的研究虽然在数量统计和逻辑推论方面值得推敲,但却堪称数学统计和实验考古相结合的一个成功尝试,前辈考古工作者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和

^① 陈晶:《开展考古学与有关自然科学的渗透研究——圩墩史前遗址应用多学科协作进行课题研究》,《常州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文编》,1988年。

^② 陈晶:《说釜》,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1年8月。

汲取。

五 圩墩遗址作为边缘性遗址的文化价值

我们在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听到“中心遗址”的概念,就是指那些位于文化区中心位置、文化堆积深厚、延续时间长、集中体现文化区域特征的遗址。这类遗址也因其典型性常被作为文化或文化类型命名的首选。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位于两个或多个文化区交叉地带、文化面貌复杂的遗址,这类遗址可以视作边缘性遗址。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比较重视中心遗址的价值,因为它们在文化研究中,具有相对完整性和时代延续性的特点,是比较理想的遗址对象;而边缘性遗址常常因为文化脉络不清,文化面貌破碎甚至文化断层而被研究者忽视。其实不然,中心遗址因其文化堆积深厚,文化影响深刻,所以它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往往是缓慢的、长期的、不显著的;而边缘性遗址因其处于文化交界区,各种文化势力在此反复争夺,尤其是以边界战争的表现形式,造成文化面貌的迅速更替,所以边缘性遗址的文化特征的变化是迅速的、短期的、剧烈和显著的。透过边缘性遗址的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某一支文化或者多支文化在某个时间段内地缘结构的变化。从我们对圩墩这个太湖西北岸的典型边缘性遗址的观察和研究来看,也较好的印证了我们的理论。

常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宁镇丘陵向太湖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长江下游航道最狭窄地段之一,这种特殊的区位环境决定了它的文化因素必然同时受到来自宁镇地区、太湖流域、江淮地区,甚至是沿江而下的长江中游诸文化的强烈影响。古往今来,此地的文化面貌一直呈现多元并立、犬牙交错的局面。崧泽文化的西部边界、良渚文化的西部边界、吴越争霸的边界乃至现代吴语区与江淮区的分野,都是以常州为界的。而这样一种地缘文化特征,实际上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马家浜时期。

近十年太湖流域的史前考古工作揭示,在马家浜时期,太湖东西两岸存在着两支具有各自发展脉络的文化类型,以陶釜的形态为主要区别,两支文化的分界线分处太湖西北、西南部,包括常州圩墩、三星村、长兴狮子山和江家山。^①在这几处遗址里面,两种文化呈现此消彼长、平分秋色的态势,符合文化边缘区相互竞争、对立融合的特征,具体到圩墩遗址而言,如果将圩墩遗址的地层断面作为时间分割点来看,圩墩遗址第④、⑤层(即报告中所提到的圩墩遗址早期阶段)出土陶釜完全是圜底釜的特征,换言之,圩墩遗址的早期阶段完全处于太湖东部圜底釜文化区的控制之下。而圩墩遗址从第③层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的平底器,则是太湖西部平底釜文化区开始影响控制此地的标志。尤其是第③层中出现的腰沿下带有竖向贴条的陶釜腹片,在当年的发掘过程中并未引起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祁头山、彭祖墩遗址中出土了完整

① 林留根、郭伟民等:《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上),《东南文化》2011年第6期。

的筒形釜标本，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圩墩遗址晚期阶段文化影响的直接来源。可以说，圩墩遗址第③层和第④层的分界，实际上就是太湖西部平底釜文化圈入侵扩张至此地的关键分界。而这个时间节点，也可以通过历次发掘的碳十四年代推算出来。圩墩遗址各次发掘采集的圩墩早期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中，以第四次发掘的两个数据最晚（ 5245 ± 255 年和 5245 ± 150 年）^①，这个年代数据——距今 5200 年前后——既是圩墩早期阶段终止的时间，也是圩墩晚期阶段开始的时间，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平底釜类型文化扩张至此地的时间节点。

从出土陶器和墓葬两方面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家浜文化中晚期，以祁头山类型为代表的平底釜文化圈，有一次明显的自东向西的扩张运动，圩墩和圩墩以西的新岗遗址均受其影响。不同的是，圩墩遗址是圜底釜文化的传统控制区，受到的文化影响相对较少，墓葬形态变化不大；而新岗遗址之前属于文化空白区，祁头山文化类型在此完成了拓荒和定居，所以，后者在葬俗和文物传统方面受祁头山文化影响更为深刻。

六 结语

圩墩遗址发掘 40 年来，江、浙、沪考古界同人和各地学者对马家浜文化的发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江阴祁头山、宜兴骆驼墩、锡山彭祖墩、溧阳神墩等一批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揭露，为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文化系统的发生和演进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解释，同时也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看待圩墩遗址在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圩墩遗址和周边遗址之间的关系，将成为今后我们要着重探讨的课题。我们愿在已有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吸收新的文化知识，推动更加全面的学科合作，共同迎接太湖流域史前文明的曙光。

原载《东南文化》2012 年第 5 期

^① 常州市博物馆：《1985 年江苏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 年第 1 期。

边缘性遗址在考古研究中的价值

——以江苏常州史前遗址为例

彭 辉

在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史前考古研究中，我们习惯把那些位于文化区中心位置、文化堆积深厚、延续时间长、集中体现文化区域特征的遗址称为“典型性遗址”或“中心遗址”；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位于两个或多个文化区交叉地带、文化面貌复杂的遗址，这类遗址则可以相应地视作“非典型性遗址”或“边缘性遗址”。也有学者将其称为考古学文化的“旋涡地带”^①。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比较重视“中心遗址”的价值，因为它们在文化研究中，具有相对完整性和时代延续性，是比较理想的遗址对象，这类遗址常常因其典型性而被作为文化或文化类型命名的首选；而“边缘性遗址”则因为文化脉络不清，文化面貌破碎甚至文化断层的现实而被研究者忽视。

如果细致地分析两种遗址类型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中心遗址因其文化堆积深厚，文化结构稳定，文化影响深刻，所以它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往往是缓慢的、长期的、渐进和不显著的；而边缘性遗址因其处于文化交界区，各种文化势力在此反复争夺，尤其是以边界战争的表现形式，造成文化面貌的迅速更替，所以边缘性遗址的文化特征的变化是迅速的、短期的、剧烈和显著的（表一）。透过边缘性遗址的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某一支文化或者多支文化在某个时间段内地缘结构的变化。从我们对江苏常州这个史前边缘性遗址集中地区的观察和研究来看，也较好地印证了我们的理论。

表一 两种遗址类型的文化特征比较

遗址类型	延续时间	文化来源	文化结构	阶段差异	演变过程	文化继承
中心遗址	长期	单纯	稳定	不显著	渐变	延续
边缘性遗址	短期	多样	脆弱	显著	突变	断层

① 高蒙河：《试论“旋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